

标题：中国为何不敢谈日本威胁论？

作者：天哪天

日期：07月06日

网址：<http://www.canchinese.com/modules/article/view.article.php/c14/2262>

中国与日本，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，却被积酿百年的仇恨与越来越表面化的不信任深深困扰着。从国际政治理性的角度来看，无论双方是否披裹着民族主义的外衣，中日两国的对立乃至冲突具有宿命般的必然性。

世界从来不太平

比起日本人来，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似乎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。

中国最早的外交家郭嵩焘认为：“夫能以诚信待人，人亦必以诚信应之；以猜疑待人，人亦即以猜疑应之，此理无或爽者。”1876年，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。李鸿章说：“两国和好，全凭条约”；“特强违约，万国公法所不许”；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：“和约没甚用处”；“国家举事，只看谁强，不必尽依著条约”；“万国公法亦可不用”。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，李鸿章还一直认为“两国交涉，全论理之曲直，非特强所能了事”；“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，我不先与开仗，彼谅不动手，此万国公例，谁先开战即谁理诎”。

当然，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，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，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。

同时期的中国外交家薛福成也认为：“所以用公法之柄，仍隐隐以强弱为衡”。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韬更是坦言：“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，亦得而兴之；国弱则我欲用公法，而公法不为我用……不可恃此区区之约，庆相安于目前也”；“惟有发愤自强，方可得公法之益。倘积弱不振，虽有百公法何补哉”。

这一类对于国际秩序的悲观认识，到了毛泽东这里，被更为简洁精辟地表达出来：“落后就要挨打”。

国际政治究竟“性本善”还是“性本恶”，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。

德国哲学家康德(Immanuel Kant)是自由主义(或曰理想主义)的先驱，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，呼唤和倡导“永久和平”。自由主义者们相信，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，“好国家”(比如民主)会战胜“坏国家”(比如专制)，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、民主的扩散、国际制度的制约等，都会推动世界和平。

但遗憾的是，考诸历史，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：

著名历史学家、《世界史纲》的作者赫伯特·威尔斯 (Herbert Wells) 曾在上世纪 20 年代写道：“对于 20 世纪而言，和平的时期是短暂的。但不久，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；”

进入冷战后，根据《第三次浪潮》的作者托夫勒 (Alvin Toffler) 在《战争与反战争》(War and Anti-War: Making Sense of Today's Global Chaos) 一书中统计，在 1945-1990 年之间的 2340 个星期里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 3 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。

“苏东巨变”之后，冷战结束，“民主和平论”、“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”、“国际制度和和平论”等等一度成为时尚。这些论断，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捍卫方面，都很容易显得“政治正确”。但是，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，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、竞争的势头。

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 (John J. Mearsheimer)，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：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，要想在其中生存，无论国家“好坏善恶”，都别无选择，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，这是一种零和博弈。他因此认为，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。而在我看来，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，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。